



南亚研究丛书

敦煌的医疗与社会

MEDICINE AND SOCIAL LIFE IN DUNHUANG

陈 明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亚研究丛书

敦煌的医疗与社会

MEDICINE AND SOCIAL LIFE IN DUNHUANG

陈 明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的医疗与社会 / 陈明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202-0234-3

I . ①敦… II . ①陈… III. ①中国医药学—医学史—研究—敦煌—古代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3712号

责任编辑: 王 宇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邹景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 字数: 371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02-0234-3

定价: 5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南亚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薛克翘

副 主 编：葛维钧 刘 建 姜景奎 陈 明

丛书前言

自古以来，南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和南亚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其直接交流的历史异常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频繁，国家关系紧密、合作空前良好。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民间交往也空前活跃，经贸往来、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加深友谊。因此，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深入开展对南亚各国的研究都显得格外重要。

恰在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南亚研究丛书》，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受出版社委托，由吾人出面组织这套丛书，不胜荣幸。吾人者，五人也，按印度的传统，可以叫作“般遮耶多”（Pancayata，今译潘查雅特），即五人会议或五人小组。由五人小组负责组织稿件、审查质量、决定取舍。

经与出版社协商，这套丛书拟出版两个系列：一是研究系列，二是翻译系列。吾人欢迎学风严谨、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欢迎文笔流畅、具有出版价值的翻译作品。专著和译著的内容可

以包括南亚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等等。

长河浩荡，不弃一涓一滴；高山嵬嵬，不遗一草一石；广厦千寻，有赖一砖一瓦。愿吾人的工作有助于中国南亚学研究的深入，增进国人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南亚研究丛书》编审五人小组

2014年10月28日

引言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时光的风沙吹散了过往的繁华与喧嚣，曾经的浓墨重彩亦渐渐褪色，而它的绝代光华却从未彻底消失。在黯淡画卷的一角或者破纸断片的背面，在不经意间，给习惯了平淡无奇的当代观众和读者们，一种久远的震撼和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击。敦煌，一个骄傲和伤心共存的名字，一个金戈铁马与佛香缭绕的地方，在那个“不幸”与“不争”的王道士无意打开尘封几近千年的藏经洞之后，又上演了多少的悲喜交加，激发了多少的怀念与感慨，让人们不能平静，也无法释怀。

“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是对文学阅读和欣赏过程的描绘。在敦煌的故事里，我们又能体会到什么？是西来东往的兴亡胡商展示的异域时髦，是粟特人聚落中表演的他乡舞蹈，还是高僧大德们南腔北调的讲唱？不，是平凡生命的兴起与消亡。在时间的巨浪冲刷中，生命总是显得那么的卑微和渺小，却又是那么的不屈和不挠。因此，敦煌的历史是政治史，是经济史，是宗教史，是文化交流史，更是生命史！不管是敦煌的常住居民，还是过往的商旅行人，无人能脱离生老病死的罗网。种族或有不同，宗教或有差异，身份或有高下，家境或有贫富，年龄或有老少，但他们对新生命的呵护，对疾病

的搏斗，对衰老的抗争，对死亡意义的追问，在在显现了对红尘的留恋和对幸福来世的期待。在健康抑或患病的时候，其欣喜、其痛苦、其无奈、其顽强，或许能对我们的现实人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纵向来看，敦煌的医疗史是中古医疗史的一个片段，但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医疗表相，而是中古中医学的一个缩影。横向来看，敦煌的医疗史是敦煌社会的综合表征，它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反映，也是社会各阶层全体人员的医疗实践，甚至包含了从西亚、中亚与南亚地区传来的医学知识。因此，要研究敦煌的医疗史，就有必要从整体的观念出发，不仅仅局限于利用那些汉语书写的本草著作、医书药方，而要在全面梳理敦煌出土文献中的胡汉医学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书，特别是那些发病书、诸杂斋文、愿文、解梦书、术数文献、佛道写经的文本与题记、宗教仪轨的活动记录、商品买卖的列表，甚至友朋书仪等相关写卷，并与传世史料和简帛资料相比勘。以往的敦煌医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校注，本书旨在从断纸残片中，重构晋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医疗史实，探讨敦煌地区的医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其与宗教、外来文化的关系，把医疗史的问题放在社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脉络来考察，以落实历史的研究——“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了解敦煌社会如何处理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或许能解释敦煌医疗的特色与意义，增加对中古生命礼俗史和中国医学史的深度认识。

目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大医精诚——敦煌文献中的医人 及其社会角色	1
第一节 敦煌医者习医的途径及其教材	2
第二节 敦煌文献中的医者形象与医疗活动	33
第二章 如病得医——敦煌病者的治疗与瞻护	79
第一节 敦煌家庭不同角色的疾患与医护	79
第二节 敦煌佛寺僧尼的疾病与医护	116
第三节 敦煌病患的社会网络与日常救助	129
第三章 四百四病——敦煌的身体认知与疾病观	143
第一节 “一脉不调，百病俱起”：敦煌的身体观与生命认知	143
第二节 四百四病：敦煌文献中的疾病类型分析	155
第三节 敦煌的宗教与术数文献中的疾病书写	176

第四章 生生之具——敦煌的医疗资源及其使用 191

第一节 玉门矾石：敦煌的土贡与道地药材	191
第二节 敦煌本草、食疗与蒙学文献所见药材名称	204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药材贸易流通与使用	224
第四节 备急单验：敦煌所见药方的配伍及应用	249

第五章 出入阳关——敦煌与古代内亚的 医学文化交流 266

第一节 敦煌与吐鲁番所见非汉语医学文献的译传	266
第二节 印度生命吠陀与佛教医学在敦煌、吐鲁番的流传	282
第三节 敦煌、吐鲁番与周边及域外的医事互动	305
结语	322
主要参考文献	325
索引	339

第一章

大医精诚——敦煌文献中的医人 及其社会角色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基本上是六朝到宋初所抄写的，还有极少量的刻本。敦煌医疗史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这批文献以及少量的图像（壁画、纸画、绢画等）资料。实际上，除那些本草著作、脉学论述、医书药方等之外，直接叙述敦煌医疗情况的大型史料并不多见，有关敦煌医者的史料更是稀少。以往对敦煌医者的考察，专题论文不多，涉及的研究对象或为敦煌医僧，或为有一技之长的粟特人，主要是索崇恩、翟法荣、史再盈等数人而已^①。本书之所以用“医人”，而不用“医家”的概念来描述敦煌从事医疗的人士，是因为“医家”偏重于指在医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做出了一定成就的大医或名医，而“医人”除指医艺高超、颇具名气的医家之外，也可涵盖一般的从医人士，其中大多数是那些普通的、活跃于各阶层从事医疗活动的医者。敦煌医者或不离医巫之间，或出入佛道之门，或游走于贵贱之家，并没有特别的范围限定。敦煌医事的内容广泛，只要是那些以维持生命健康、祛除疾病为宗旨的活动，都可以涵盖在内，并不仅指开方服药一类的事情。治病的灵验与否可视作决定敦煌医者处境的根本指标。

^① 党新玲：《唐敦煌药王索崇恩》，《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61~62页。党新玲：《唐敦煌医王翟法荣》，《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58~59页。党新玲：《五代敦煌粟特人医家史再盈》，《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9~10页。郑炳林：《唐五代敦煌医学酿酒建筑业中的粟特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19~25页。郑炳林、党新玲：《唐代敦煌医僧考》，台湾：《敦煌学》第20辑，1995年，第31~46页。谭真：《敦煌隋唐时期医事状况》，收入段文杰主编：《一九九〇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石窟考古篇》，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402~413页。

第一节 敦煌医者习医的途径及其教材

一、敦煌的官方医学教育与教材

敦煌是中原文化的传承之地，其教育机制相当多元，在不同的时期至少包括了官学、私学、义学（义塾）、寺学与道学等多种形式^①。敦煌的官学由比较完备的两级组织——州学（郡学）和县学组成。姜伯勤先生在《敦煌社会文书导论》中指出：“敦煌有相当完备的州学、县学两级学校体制。”^②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代沙州的州学“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县学则在“州学西连院”。在官方的教育机制内，除教授传统的儒家经典外，还有医学教育的内容。《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说明医学的教育纳入了州学之中。

隋唐五代的医学教育有官私之别，官方的医学教育由各级医疗行政机构负责，而“私”这个层面的，则包括民间家传、师徒相授（含私塾教学）、个人自学，乃至寺学中的医学教育。敦煌的寺学不仅是对州学和县学的有力补充，而且是开发民智、传播宗教和联系民众的重要途径之一。

初唐伊始，朝廷对地方医学就颇为重视。贞观三年（629）九月十六日，诏诸州治医学。敦煌应该也在官方医学体制的序列之中。在见存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敦煌有官方体制内的医官。P.2657《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云：“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令狐思珍是天宝年间（742~756）的医学博士。在当年登记的时候，令狐思珍为51岁，这样的年龄表明他担任传授医学知识的医官应该颇有些年头了。据《唐六典》，按照唐制，大都督府的配置是医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是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则是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的配置是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是医药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则是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十人。唐《医疾令》（据宋《天圣令》复原）第31条规定：“诸州博士教授医方，及生徒课业年限，并准太医署教习法。其余杂疗，行

^① 李正宇：《唐宋时期敦煌的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39~47页。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231~270页。

^②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86页。

用有效者，亦兼习之。”^①因此，敦煌既然有令狐思珍这样的医学博士，那么就必定有接受官方医学教育或者说是由官方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医学生。

吐鲁番地区有类似的情况。唐灭高昌国后，在西州建立了官学机制，包括州学、县学和医学。作为一个下州，西州的配置为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十人。哈喇和卓一号墓出土《唐西州某乡户口帐》的第一件残文书[64TKM1:28 (a)、31 (a)、37/1 (b)、37/2 (b)]中，保留了西州确切实行过官方医学教育的记录，即“二人医学生、七人州学生、口人县学生。”又，吐鲁番阿斯塔那380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和义坊等差科簿》中记录的“刘威感廿九，医学助教”，亦证明作为偏远之地的西州官方医学的存在^②。显庆三年（658），西州在改制为中都督府之后，官方医学规模也略有扩编，即增加了医学生五人。这种升格的规模较少，却有体制内的含义，即反映了该地区政治重要性的提升与人口数量方面的增长。可见即便是在边陲之地，唐中央政府对地方包括儒学、医学在内的教育也是相当重视的^③。

按唐《医疾令》的规制，中央太医署所使用的官方医学教材不是单一的，按照专业的不同而选择多种典籍图册。唐《医疾令》第3条指出：“诸医、针生，各分经受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④也就是说，医生与针生所学习的教材至少包括了十三种文献，即：《甲乙》、《脉经》、《本草》、《张仲景方》、《小品方》、《集验方》、《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流注图》、《偃侧图》、《赤乌神针经》。这些教材基本上属于汉晋六朝隋唐以来的中医名著，代表了当时中医学的最高认识。医学生习读这些教材也是分科分级进行的。又，唐《医疾令》第

^① 陈锦校录：《医疾令卷第二十六》，收入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21页、第580页。

^② 《唐西州高昌县和义坊等差科簿》，编号67TAM 380:01 (a)。参见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65页。作者提供此论文，谨此感谢！

^③ 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医学教育与医疗实践——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三》，收入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6~462页。

^④ 陈锦：《唐医疾令复原研究》，收入《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78页。另见《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条。

4条指出：“诸医、针生，初入学者，先读《本草》、《脉诀》、《明堂》。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次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其兼习之业，各令通利。”^①既然在朝廷层面的太医署医学教育中是使用这些官颁的教材，那么，很有可能这些教材同样适用于地方医学教育之中。

现存的敦煌汉语医学文献内容广泛，既有中医的基础理论、临床各科的大量医方、多部本草专书、针灸等非药物疗法，还有涉及佛道的医事杂录等，大致如从春雨所归纳的那样：“从阴阳五行学说到肺腑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从脉学诊断到内、外、妇、儿，从遗书到大量的古医方，从本草学著作到敦煌遗书中的医事杂论，从古藏医文献的发掘到独具一格的道医、佛医的展示。总之，从基础到临床自成体系，突出古丝绸之路的地方特色，成为敦煌中医药文献的重要内容。”^②从春雨还将这些中医药写卷分为八个类型：医理类、针灸类、脉法类、本草类、医方类、道医类、佛医类、医事杂论类^③。而马继兴则将它们略分为五种：医经诊法类、医术医方类、针灸药物类、其他医术类、医史资料^④。自敦煌文书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对其中的医学写卷的整理和研究就没有间断过，罗振玉、王国维、罗福颐、冈西为人、中尾万三、三木荣、马继兴、小曾户洋、王淑民、沈澍农等氏，对这些卷子的名称、年代、撰者姓名、文字等问题进行过或深或浅的考证^⑤。罗振玉的《石室粹金》、《吉石盦丛书》和罗福颐的《西陲古方伎史料残卷汇编》等均收录了不少的医学文书。近三十多年来，学界对这些文献已经做了较好的校录、整理和研究，主要的著作有：马继兴主编的《敦

① 陈锦：《唐医疾令复原研究》，收入《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78页。另见《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条。

② 从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页。

③ 同上，序言部分。

④ 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樊正伦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收入《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该书将敦煌医药文献分为上述五大类，没有收录藏医文书。

⑤ 以往的研究情况还可参见王风兰：《敦煌医学资料研究概况》，《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第1期，第45~47页。

煌古医籍考释》^①和《敦煌医药文献辑校》^②，赵健雄的《敦煌医粹》^③，王淑民的《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④，范新俊的《如病得医——敦煌医海拾零》^⑤，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和《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⑥，李应存与史正刚合著的《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⑦，以及两人与李金田合著的《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⑧，陈增岳的《敦煌古医籍校证》^⑨，王淑民编著的《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尤其图文并茂，颇为便捷，值得参考^⑩。近年来，又有袁仁智与潘文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⑪、王兴伊与段逸山合作的《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⑫、沈澍农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录》^⑬、王亚丽的《敦煌写本医籍语言研究》^⑭等著作值得参看。海外学界，2005年，英国学者罗维前（Vivienne Lo）和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合编了《中古时期的中医：敦煌医药写卷》一书^⑮。2010年，法国的戴思博

① 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② 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樊正伦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 赵健雄编著：《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 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年。

⑤ 范新俊：《如病得医——敦煌医海拾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⑥ 丛春雨：《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⑦ 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⑧ 李应存、史正刚、李金田：《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⑨ 陈增岳编著：《敦煌古医籍校证》，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

⑩ 王淑民编著：《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

⑪ 袁仁智、潘文主编：《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⑫ 王兴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⑬ 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⑭ 王亚丽：《敦煌写本医籍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⑮ Vivienne Lo and Christopher Cullen, ed., *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5. 该书中三篇论文的中文本已经先期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即：刘乐贤《敦煌写本中的媚道文献及相关问题》（第101~113页）、王淑民《敦煌本〈汤液经法〉佚文研究——兼论经方对中医方剂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第183~195页）、赵平安《谈谈敦煌医学写本中的释字问题》（第197~204页）。这三篇论文的英文本都有不少变动，应该两种文本同时参阅。

(Catherine Despeux) 教授主编了《中古中国的医学、宗教与社会：敦煌吐鲁番出土汉语医学写卷研究》一书^①，共分两册（另有索引一册），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国际学界对敦煌吐鲁番医学研究的最新趋势。

现存的这些敦煌中医药写卷中，应该保留了一些当时的医学教材，有的是官方医疗体制中的教科书（或者学习用文本），有的是民间医生的自学教材。它们应该有这样的三种类型：①国家规定的医学教育或考试用书；②敦煌当地的医师著述，或者地方医学教材；③出于自学或者家庭医疗目的而自抄的古医书（尤其是药方），当然有些也可能是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的。根据唐代官颁的医学教材和考试用书的目录，二者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在敦煌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著述，或许可以印证当时敦煌医学教育的某些具体情形。

1. 《甲乙》

《甲乙》是指西晋皇甫谧（215~282）编纂的《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出身世家大族，虽仕途不显，但生活无忧，其生平见《晋书》本传。他一生好学，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博综典籍百家之言。由于得风痹而学医，他始习览经方，遂臻至妙。皇甫谧取《黄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撰为《针灸经》十二卷，被喻为“历古儒者之不能及也”。流传后世的《针灸甲乙经》十二卷，共128篇，取材《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一部奠定针灸学学科基础的一部专书。该书考订并确定人身孔穴名称350个，被称作“现知最早将以经脉学说为主体的针灸学理论与腧穴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专著”^②。

敦煌出土的P.3481R中有13行残文，内容与脏腑病形相关，马继兴、黄龙祥定名为《针灸甲乙经》，李应存、史正刚进一步确定为《针灸甲乙经·卷之四病形脉诊》节选本。P.3481R以问答的方式，论述了心脉与肺脉各自的缓、急、小、大、滑、涩在“微”、“甚”两种脉象状态下的“形病”。^③这与传世本《灵枢·邪

① Catherine Despeux, ed.,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 Manuscrits Chinoi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10. 梁其姿撰写的书评，刊于《汉学研究》第30卷第2期，2012年，第315~320页。

② 参见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193页。又，相关的文本校注，可参黄龙祥校注：《黄帝针灸甲乙经》（新校本），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姜燕：《〈甲乙经〉中医学用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③ 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气脏腑病形第四》和传世本《针灸甲乙经·卷之四病形脉诊第二下》的内容相似，但文本的问答结构略有不同，因为后二者的原文中均为“黄帝曰”和“岐伯曰”，即是以黄帝和岐伯之间的一问一答来展开的。至于为何敦煌本中将“黄帝曰”和“岐伯曰”变为一般的“问曰”和“对曰”，并省略了“请问”和“臣请言五脏之病变也”等语句，这说明敦煌当地的抄写者对教材亦略有简化，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便于记诵。此外，或谓俄藏敦煌文献中有Дх.00235、Дх.00239、Дх.03070三张残片，对应《针灸甲乙经》卷三的内容。Дх.02683和Дх.11074两叶残片，也被认为是抄写了《针灸甲乙经》卷六之“阴阳大论第七”与“正邪袭内生梦大论第八”的内容，可定名为《针灸甲乙经（阴阳大论、正邪袭内生梦大论）》^①。虽然这些残片抄写的年代不太清楚，但亦可从侧面证明《针灸甲乙经》在敦煌当地确实有所行用。此外，旅顺博物馆所藏《针灸甲乙经》残片与俄藏相关文书有所关联，也是唐代官方医学教材在吐鲁番地区行用的例证^②。

2. 《脉经》

《脉经》是指西晋王叔和所撰的《脉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诊专著，记录了三国西晋之交的脉学成就。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曾出任太医令。据宋代张杲《医说》引张湛《养生方》云：“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经方，尤精诊处；洞识摄养之术，深晓疗病之源。采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篇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③《脉经》如其序中所说，“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即在总结前人丰富的脉诊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初步建立了具有独特理论色彩的脉诊体系。王叔和归纳了24种脉象，并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所记载的有关寸口脉的三部（寸、关、尺）划分法，成为垂范后世的准则。

^① 王杏林：《关于俄藏敦煌文献Дх.2683、Дх.11074残片的定名》，《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第105~108页。

^② 刘敏于2016年8月在无锡举行的“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旅顺博物馆馆藏文书所见唐代西州地区医疗与社会——以新发现的LM20~1455~31~15为例》：“将旅顺博物馆所藏《针灸甲乙经》残片与俄藏相关文书关联研究，认为该典籍为唐朝政府所列医学生学习、考核的官方参考书目之一，因而于吐鲁番地区通行，为医疗史、社会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又一有力例证。”参见段真子：《“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132~135页。

^③ 参见廖育群、傅芳、郑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